

胡愈之著

郁達夫
的
流亡
和
失踪

胡愈之著 庚子記

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

一九四六年九月
香港咫園書屋版

目次

一 從圍城中出走·····	二
二 原始森林中的生活·····	六
三 進入蘇門答臘內地·····	一〇
四 在巴爺公務·····	一三
五 趙鬍子失蹤了·····	二二
六 被害的證實·····	二八
七 一點感想·····	三一
後記·····	三五
附錄：亂離雜詩·····	三七

郁達夫先生，中國新文藝運動中的一個偉大作家，失蹤以後已經整整一年了。郁先生在最後時期，住居在蘇門答臘西部的一個小市鎮裏。自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間八時他離開了他的家以後，再沒有人知道他的蹤跡。我和郁先生的許多朋友，以及蘇島的華僑，用盡一切方法調查探訪，毫無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凶多吉少。到了最近，棉蘭的聯軍總部方面透露消息，纔證實了郁先生於去年九月十七日遭日憲兵殺害。

這樣看來，郁達夫先生是早已不在人間了。他已遭了日本法西斯的毒手了。對於中國文藝界，這是一個無可補救的損失。對於國內外郁先生的友好們，這是一個不堪忍受的打擊。

譯者 我和達夫相識二十年。一九三二年，達夫和我，參加蔡元培宋慶齡兩先生所領導的中國

民權保障同盟的工作。後來楊杏佛先生遭暗殺，達夫被迫離開上海，以後我們就少見面的機會。直到抗戰開始以後，我們才又在武漢晤面，我們一同在軍委會政治部工作。隨後，達夫和我相繼來了新嘉坡，服務新聞界。新嘉坡淪陷前後，我們一同出走，一同過流亡生活，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我們時常在一起。關於達夫的生平事略及其在中國文藝界留下的業績，並不須要我來介紹。惟有他在淪陷時期的流亡生活和失蹤前後經過情形，我知道的比較親切。我應當向國內外文藝界新聞界同人及郁先生的親戚朋友們，作一個詳細的報告。這是我對亡友應有的責任。祇是因爲郁先生被害的消息始終未經證實，因此我把這一件早應當做的工作，拖延下來，直到一年以後的今日，才寫成這一個報告。對於各方面急於想獲得郁先生消息的一些朋友們，我感到無限抱歉。

一 從圍城出走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郁達夫先生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報編輯，兼任英政府情報部所發刊的「華僑週報」的主編。戰事發生後，新加坡文化界組織了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並創辦了

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班，我和郁先生一同參加工作。郁先生担任文化界工作團主席和訓練班的主任。一九四二年一月初，陳嘉庚先生領導的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成立後，我担任宣傳部工作，郁先生任動員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戴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由於工作的關係，這時期達夫和我幾乎是天天見面的。

英國政府急來抱佛腳，雖然允許動員華僑抗日，但已經太遲了。英海軍太平洋艦隊，在開戰的一星期內就遭覆滅。守衛馬來亞的英印軍隊節節退敗。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日軍已攻抵柔佛的新山橋頭，和新加坡祇隔一條狹窄的柔佛海峽。新加坡軍港和市中心區都在敵人砲火射程中。再加上敵空軍狂炸馬六甲海峽的船隻和沿岸的碼頭倉庫。新加坡被包圍得鐵桶似的，英軍雖然還作反攻的空口宣傳，人們心頭却都在估計着最惡劣的局勢會立即到來。

在這最緊張的幾天中，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主席陳嘉庚先生曾經向新加坡總督湯麥斯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萬一撤守時，應給予抗委會工作人員安全撤退的便利。可是湯麥斯總督答覆不能負責。而同時據英政府方面所洩露，中國政府通過外交機關向英國交涉，也祇要求英軍保護中國領事館人員及鄭介民領導的軍事代表團安全撤退，而對於華僑抗日領袖及民衆

的撤退問題，則一字不提。

陳嘉庚先生對於這事勢，感覺憤懣和失望。他就決定和抗委會一部份負責人員，雇了小艇，冒險撤退到安全地區。陳先生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離開新加坡。後來在蘇門答臘登陸，再由蘇島流亡到爪哇，避匿在泗水附近的一個小地方，一直到戰爭結束為止。

陳嘉庚先生離開新加坡那天，參加抗委會工作的一些文化界朋友，開會商議，大家認為英國既沒有死守新加坡的決心，留在圍城中，白白犧牲，毫無意義。所以決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蘇門答臘，再作打算，小船是由劉武丹先生預先設法雇定，留給文化界撤退用的。這一次撤退的人員我和達夫之外，有抗委會宣傳部副部長唐伯濤和邵宗漢先生，宣傳工作人員王任叔，張楚琨，王紀元，汪金丁，鄭楚雲，蔡高崗，劉道南，高雲覽，陳仲達，劉岩諸先生以及李振殿，李鐵民先生等。撤退以後，宣傳部工作移交華僑抗日義勇軍和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抗日宣傳隊辦理。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當時一部份文化界朋友，向中國領事館辦理回國護照時，領事館方面說是奉中央命令，對某些「文化人」，不准發給護照。據說我的名字也在內，為

子這事，我曾經向總領事高凌百，海外部代表葉公超交涉，請其向中央問個明白，是不是已經把我們的國籍開除，不然，斷沒有對一個中國人停發回國護照的理由。後來領事館有沒有去電向中央請示，我不知道。不過，我們的回國護照是由領事館送來了。有了護照以後，去蘇門答臘還得經過荷蘭領事館簽證。荷印政府當時拒絕除了婦孺之外的任何難民入境。因此新加坡的荷蘭領事館拒絕簽證，但是我們決定不管，到了蘇門答臘登岸時再辦交涉。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清晨，我們的難民船（一隻破舊的小電船）載着二十八個男女老少難民，悄悄地從新加坡開行了。達夫和我各人祇帶了兩個手提箱。達夫在一星期前已把他的兒子郁飛託朋友帶回國去。剩下在新加坡的一屋子書籍也送給了朋友。當我們的船正駛出新加坡港口時，敵人大編隊的轟炸機已經襲來，隱約聽到新加坡市內響着警報。接着是一片爆炸聲。當時有一架敵機，掠過我們頭上。但因為我們的船太小了，微倖沒有成為敵機的目標。一小時以後，遙望新加坡，祇見三縷濃烟向天空直冒。我們算是離開危險區域了。大家默然無言，心中却在默念着：「別矣新加坡，什麼時候才和你再見呢？」

二 原始森林中的生活

當天傍晚，當難民船駛抵離新加坡最近的一個荷屬小島巴美吉里汶時，島上荷蘭官員竟誤當作是日軍的登陸艇，向我們開槍示威。一場誤會消釋後，我們當被允許登陸，但因爲我們大多數都是沒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續，所以在那島上被扣留了兩天，到二月六日晚間，才駛抵另一個小島石叻班讓。劉武丹先生一家和茲九等已先一天在那邊等候我們。在那邊休息了一晚，大家商量此後的行動方向。後來決定，我們七人首先出發，經蘇門答臘大陸，再設法去爪哇。這七個人，除了我和達夫之外，是唐伯濤，王紀元，邵宗漢，沈茲九，張綠繡。當時我們估計，新加坡雖不能守，聯軍撤退到爪哇，至少應當可以堅守數月。我們打算先去爪哇，再看形勢，如果在爪哇能找到船，或者還有回國的可能。

石叻班讓是一個小島。我們要求去爪哇，島上的荷蘭官做不得主，所以把我們送刊另一海島——望嘉麗——那邊。二月九日我們到了望嘉麗，由當地商會會長吳先生招待，住在華商俱樂部。我們去見了當地荷蘭分州長，要求准許我們去爪哇。副州長說要打電報向吧城（荷印

首都）請示，就把我們一羣人的履歷抄了去，以後我們每天去催問有無回電，總是說回電還未到。直到了第五天，荷蘭官說回電來了，政府不答應我們去爪哇，祇好暫留在島上。本來，荷蘭政府對華僑文化界人士入境，限制極嚴，現在中國與荷蘭已經是同盟國了，而且我們是難民，但荷蘭政府依然不讓我們行動自由。後來聽說陳嘉庚先生經過蘇門答臘，也遭荷蘭人留難。荷蘭政府對我們華僑這種德政，是我們所不能忘記的。

但是唐伯濤先生在新加坡已獲得荷蘭領事簽證，所以荷蘭官對他特別通融，准許前進。於是他一個人出發，由蘇門答臘內地，轉巴東港。後來在巴東港搭了英國軍艦經印度回國了。剩下我們六個人，留在望嘉麗，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又是氣憤，又是焦急。每天祇是聽着從馬六甲海峽對岸傳來的砲聲，這砲聲是一天比一天緊了。每晚則從無線電收音機，聽着各方面的戰訊，消息一天比一天更不利。到了二月十五日傍晚以後，海峽對岸的砲聲忽然靜寂了。我們知道事情不妙，到了深夜，我們再聽爪哇方面聯軍電台廣播，宣佈新加坡失守，英軍司令柏斯華中將已向日軍投降，這一晚大家憂急得不能入睡。新加坡既已失守，離我們所在地祇有一水之隔，敵人隨時可以在這小島登陸。我們不能再逗留在這危險區域了。我們

祇好再去見荷蘭分州長。那分州長正在慌張着整理行裝，準備逃跑，見了我們就說：『現在你們的行動不再受限制了。你們隨便去那里都可以。』

這句話把我們氣得要死。因為數日前到蘇島內地還有汽船，荷蘭人不放我們走，現在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荷蘭人扣留了，有什麼方法向前走？而且走到那里去呢？

幸而有一位陳仲培先生，是熱心的當地華僑，他住在望嘉麗對岸一個名作「保東」的小村子裏。他是一家電船公司經理，有一隻電船往來於保東和望嘉麗之間。前幾天，他來看我們，說我們沒有地方去，可以到他家裏暫避風頭，這時候，我們想不出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就決定當天搭電船去保東村，看那邊的情形再作計較。

二月十六日傍晚，我們到了保東村了。陳仲培先生一家人十分殷勤地招待我們。我們在他家隔壁租屋下來。這個保東村是一個未開闢的荒村，前面是一條小河，十分幽靜。全村祇有三三家華僑，此外都是印尼人。在那邊，我們住了約一個半月。開始學印尼語。達夫每天寫一首詩。他所存亂離雜詩十一首，大半是在那村子裏寫的。

在保東的時候，我們對戰局還抱樂觀。我們以為聯軍撤退到爪哇之後，可能增援反攻，

至少在爪哇支持數月是不成問題的。所以我們打算找一條安全的路，走到爪哇，再搭船渡印度洋回國。不然在爪哇幫助當地華僑做些抗敵工作也好。因此我們託人到史打聽，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到船去爪哇。可是到了三月九日，我們這最後的一線希望也斷絕了。那天晚上，我們從收音機聽到爪哇荷印總督向日軍投降的消息。爪哇既已淪陷，我們再沒有走到安全地帶的路了。在這時候，東村附近一帶風聲緊急，日軍早晚要來接管附近小島。我們六個外來的人住在陳仲培先生家中，對他很不方便。我們不能不做長明隱蔽的打算。商量了幾天之後，決定把我們六個人分成兩批，找兩處偏僻地方改換姓名職業，隱匿下來。過了幾天，達夫和紀元兩人第一批出發找到了一個地方，離保東村十許里遠一個海邊的小村，名作彭德嶺。當地有一位熱心華僑寇文成先生幫忙他們，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從寇先生店中挪了一些貨色放在店面，作爲掩護。這人改名趙德清，做小店的頭家，紀元改名汪國材，是他的夥計。那個小村只有數十家人家，周圍是未開闢的森林，當地物價還算低廉。他們兩人把剩下來數百元逃難費，撥出一部份預先買了米收藏起來，準備過長期的隱蔽生活。過了幾天我和茲九，綠綺，宗美，作爲第二批遷移到巴唐島（P. Padang）沿海的一個「木廊」（即森林採伐工

場裏。那地方只有一家木廊，是陳仲培先生經營的，除了六七個伐木苦力工之外，沒有人跡。整個島上是高可參天的原始森林，只有猿猴和山豬麋鹿出沒其間。雖然是個荒島，但爲避免敵人追蹤，這裏算是最安全的。所以我們四人決定長期住下來，除預先買了些糧食外，還打算自己種菜捕魚，解決生活，這地方和彭鶴嶺只有一水之隔，遇順潮時只要兩點鐘可以划小船到對岸。但爲了怕發生枝節，我們和達夫紀元都不敢時常往來。

三 進入蘇門答臘內地

我們雖然在人跡未到的森林地帶分別隱匿起來，但和附近小島上一些難民朋友，仍然保持聯絡。大家用小艇來往，傳遞消息。這時從新加坡陸續流亡到附近一帶小島上的難民，大約有一二百人。其中一部份是僑領和富商，另一部份是教育界新聞界人士，都是因爲不願和敵人合作，從新加坡砲火中逃出來的。這些小島上華僑人口寥寥可數，驟然增加了一二百個難民，不免鬧的沸沸揚揚。後來連昭南島日本憲兵部也知道了，因此我們就不能再安心住下去。

、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間，昭南市政府派了李玉榮（現任南洋商報社長）王鉄漢兩人來石叻班讓，住林建達先生宅中，這兩個人，據說是奉日憲兵部命令來「邀請」一些僑領回昭南島去的。被邀請的名單，列有十餘位福建僑領，第一名是陳嘉庚先生，此外是李振殿，劉武丹，黃奕歡，周獻瑞，顏世芳，林慶年，林謀盛，王吉士，唐伯濤，周炳炎先生等，陳嘉庚先生等是從另一條路線到蘇門答臘的，所以找尋不到，但其餘許多位僑領的住址，却都被發現了，於是其中李振殿，劉武丹，周炳炎，顏世芳等四位先生，都被送到昭南島。據劉武丹先生後來親自告訴我，他們四個人，到了昭南島，就被拘禁在中央警察署，遭憲兵刑審毒打，在獄中吃了四十天的苦，才由僑華協會担保釋出。

當昭南島派來的人員到了石叻班讓的時候，我和教育界新聞界的一羣難民朋友，就在德洛對岸的一個板廊內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參加者二十餘人。當時大家的意見，以為昭南島第一批「邀請」的雖然是些有錢的僑領，但是那兩個派來的人員知道另有一批教育界新聞界人士隱匿在附近一帶，回去報告，日後一定會被牽連，這些小島現在已經不是安全地了，至少達夫和我過去參加領導新加坡文化界抗日工作，為敵人所注目，一定非離開這附近不可。

要是我們兩人住在附近一帶，其他難民朋友是都會受累的。

既然是大家的公意，我們是非離開不可了，但離開這些小島，要去哪里呢！當時方君壯先生提議買一條舢舨船，飄流去印度，但大家都覺得這沒有把握。到最後決定，還是向蘇門答臘大陸上走。從這些小島溯沙志河（Soengai ziah）而上，在下干峇魯（Pasau Baroe）登岸，可達蘇門答臘西部。在那邊沒有什麼熟人，就不至被敵人追蹤了。

會議以後，我到彭鶴嶺，把大家的意見告訴了達夫和紀元。達夫最初是猶豫着。因為我們是浙江人，不會說廈門話，馬來話學習得又不久。蘇島西海岸一帶，大部份是僑生，國語不大通行。我們冒險前往，困難是很多的。可是這時候，附近一帶到處有謠言，說是昭南島要繼續派人來搜索。我住在陳仲培先生的板廊裏。他也勸我們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於是我們才決定了。我們六個人仍分兩批，去下干峇魯。達夫和紀元是第一批，我和宗漢，茲九，綠繡是第二批。船是陳仲培先生代雇的。約定達夫紀元先去下干峇魯。我們第二批，因為有女眷，暫在離下干峇魯二十餘公里末旦地方的木廊內住下，等待第一批平安到達後來信通知，再行前進。我們又約定大家重行換過一個姓名，達夫改名趙廉，我改名金子仙，我們都以商

人姿態出現。無論如何，進了蘇島大陸以後，再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們的真姓名了。

達夫和紀元出發後，紀元在中途病了，就在一個小市鎮上留下來，過了約兩星期方繼續前進，所以達夫是一個人跟着一位不相識的商人坐了小船去的，我們則在末日住了一個半月，接到紀元的信以後，才雇船去卜干峇魯，在卜干峇魯住了五天，再坐公共汽車去巴爺公務。到巴爺公務已經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達夫比我們先一個半月到了那裏。我和茲九母女，在近郊會和尚先生的椰樹園中住下來，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才離開去棉蘭。

四 在巴爺公務

巴爺公務 (Pajakoem boeh) 這個地名，在普通地圖上面是不容易找到的。這是蘇門答臘西部高原的一個小市鎮，處在巴東 (Padang) 東北一百八十八公里，離武吉丁宜 (Boekit Tinggi) 亦名花的國 () 三十三公里，以巴爺公務爲起點，有一條鐵路，經武吉丁宜，通至巴東。巴爺公務市鎮上人口約萬餘，其中華僑約一千餘。華僑以僑生居大多數，大部分操馬來語或閩南語，鎮上祇有一個中華小學校。